



人夫如南吳為人四第起右排二第。影留時職任館使大蘇駐國中科斯莫在（人七第起右排三第）如南吳年五十二國民  
。使大慶惠顏為人五第

# 我最後一任的外交職務

吳南如原著  
吳崇蘭校訂

## ——當年我國與科威特王國建交談判的一幕

編者按：吳崇蘭女士新著「二哥吳南如」一書已交由本誌編印單行本，正在排校中，本文係吳女士新著附錄之一章，謹先在本誌揭載，以饗讀者。



抗戰勝利奉派出任中華民國駐瑞士公使時的吳南如先生

凡事大家都認為做不到的，而事實結果出乎人的意外居然做到了，這不是人人都要稱為奇跡出現麼？我於當年中國與科威特建立邦交一事，也如此看法。我服務外交界前後凡四十六年，最後六年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〇年。那時我正在駐伊朗大使任內，政府有將我他調之議；但另給我一項重要任務，那就是與科威特政府磋商建立邦交。科威特於一九六一年宣佈獨立，是脫離英國統治的一個新興小王國，面積僅七千餘方公里，人口約九十一萬餘（一九七一年統計），誠所謂小國寡民；但產石油甚豐。據一九七〇年統計，這年石油外銷總值達美金十五億元，為中東國家產油最多的第四國。我國則因科威特加入聯合國後，已是聯合國之一員，握有對中國問題的一票，此為我方所必須爭取者。當科威特宣佈獨立之時，我政府曾去電道賀，嗣即與該國政府接洽彼此建立邦交。

科威特政府內部早就分為兩派：一為親美派，主張即與中華民國建交，科威特的君主及其皇儲兼國務總理等之元老重臣均屬之。另一派為親共派，當時年青少壯的外交部長及財政

部長均屬之，這派是受埃外交政策的影響，趨向左傾。從科威特宣佈獨立後，共匪即派駐埃及大使與科威特接洽，由於科威特外交部反對，未獲結果。當我受命與科威特接洽建交之時，科國正受兩方壓力，左右不得，頗為躊躇，乃拒絕兩方，從長考慮。對我第一步要求，說明我以和好使節的身份拜訪科國國王，彼方不敢輕易答允，尙支吾其詞，多所推辭；經再三疏說，始允此次晉見僅是友好性質，請勿涉及其他政治問題，我亦同意。政府並派當時駐馬拉威大使趙金鋪為訪問科威特之友誼和好副特使，約定於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晉見科王。我等於先二日到科威特京城時，科政府歡迎如儀，安排下榻於最新式的卡爾頓大飯店。十六日，循例拜訪科國外交部及禮賓司，當經決定於十七日上午九時半謁見科王，十時謁皇儲兼國務總理，十時半晉見外交部長。



伊朗皇宮酒會穿中國古裝衣裙者為吳南如夫人（左）  
戴黑舌白帽低頭凝神看物者為吳南如大使。

當我和趙副特使赴科威特的前夕，在伊朗大使館與同事們聚談，徵詢彼等對於這次訪問科威特的意見與期望；研討結果，咸以為彼方既歡迎我等友誼和好訪問特使，除謁見科王外，當可相機提出建交問題。我和趙副特使即持此信念前往科京。十月十七日晨九時許我和趙副特使乘科外交部所派禮車逕赴王宮。科王患羊角風，繃一腿，兩腳不能履地，且衣冠不整，見我等即起立，略言喧，各就坐。我肅立致詞，略謂『本人今日以中華民國 蔣總統之特使身份，向科王陛下敬致欽佩之忱，至感榮幸！中科兩國民族向無衝突的事件，而具有共同合作的可能。關於兩國關係的發展，蔣總統頗具有欣悅的展望』。科王答詞略謂『委員長蔣介石先生，英名久著，勳業彪炳，一九二六年誓師北伐，完成統一中國大業。又於一九三七年宣佈對日抗戰，終於一九四五年將日寇驅出國境。凡此重大驚人之事，余莫不牢記在心，深表敬佩。最近一九六一年科威特申請加入聯合國為會員國，蔣總統的代表均持維護正義和平的立場，對科國予以同情援助的態度，科國代表深為感謝』。科王續稱：『蔣總統今又派貴特使爲了增進友誼，繼續和好，前來敝國，特別訪問本人，更深感謝。本人健康尙



二哥吳南如（一書著者吳崇蘭女士（左二））偕夫人周谷（左）與吳南如（右二）及吳南如夫人（右）合影。

可，但患羊角風之症，略覺困擾，幸賴本國醫生有處治藥方，尚能控制症狀，不使猖獗。貴特使於回國覆命時，務請轉告 蔣總統釋念，並代致關切的謝忱。本人尤願乘此機會，煩請貴特使代向 蔣總統問好。我當即表示：『中科兩國既屬友好，陛下對敝國 蔣總統又具有如此珍貴的友誼，本人不揣冒昧，敬建議中科兩國乘此機會建立邦交，互派大使，不僅今後國際間發生任何重大事件，陛下可以透過敝國派駐貴國的大使，與敝國蔣總統通訊，或以電話交換意見；即對 陛下健康情形，亦可隨時通電，晨昏定省，不致消息隔膜，有感不便之處』。

科王至此，不禁很興奮的說：『本人原欲與中華民國通使，但我方略有困難，因為敝國是一個成立不久的王國，外交人才不多，實在派不出適當人選，擬稍過些時間，外交人才略多，即可互派大使』。我接着很誠懇的說：『陛下果願與中華民國建立邦交，僅顧慮外交人才缺乏，本人敬願代籌一個辦法，那就是貴國政府同意中科兩國先行建立邦交，成立外交關係，可由中華民國先派遣駐科大使，行使外交職權；待貴國政府認為適當時期到來，隨時派遣駐中華民國大使，敝國政府當甚歡迎』，科王對我微笑，稍頃，就說：『此意甚佳。閣下既有此提議，本人即同意照此辦理』。我答：『如此甚好，中華民國亦同意照此辦理。並請陛下告知貴國外交部長與本人討論這問題時，亦即同意如此辦理』。科王頻頻點首，並面囑翻譯官一一記錄下來，不致使科外長誤會。科王再向我領首說：『這事照辦』。我等始興辭。向科王辭別已是上午十時，我對趙副特使說：『時間已來不及，最好與科外長約會能在明日上午九時半，則科外長已有充份接洽的時間，而能瞭解科王對我建立邦交的新決定，此為對我最有利的辦法。否則，若科王新訓令尚未達到，科外長，則科外長與我談判中科建交時，必有許多不接頭之處，而致妨礙該項談判的進行』。車抵科國務院，獲悉科外長與我約會時間已改在明日上午九時半，因為原定於今日上午十時的約會，由於科王與我在王宮談話延長了時間，所以另行改訂。



這一約會時間的改訂，與我的想法不謀而合。十月十七日上午十時許，我和趙副特使到科國務院謁見首相，我乃啓齒道歉，說明赴約延遲半小時的原因。首相就說：『王宮已來電話，因談話過久，延遲半小時，有何可說呢？幸勿介意』。我微笑點首，感謝他寬宏的慮有。寒暄既畢，我大膽的提出建交的建議。首相幽默而像講笑話似的說：『阿拉伯有句古話：「要找談話，要找真正的對象而後可」。我現在要說爲中科建交問題而找我，不是對象錯誤了麼？』示意我應當去找外交部長詳談，我岸然不爲所動，報以一笑，說：『我們中國也有一句古話，就是說「我們要找一個屋內最重要的人，和他談最重要的問題」，現在殿下以皇儲之尊，兼掌國務總理之印，內政外交大權在握，財政軍事各項措施悉聽尊命。這個人豈不是這屋內最重要的人麼？我找到了這個人，來談我心中最重要的事，不是最適當麼？』首相被我這一番恭維話直說得哈哈大笑。他表示『好說，好說』。

我接着說：『本特使懇請殿下贊助的祇是這個問題的一小部分，中科建交的大部分已荷科王陛下剛才晤談中欣蒙允。關於貴國外交人才缺乏，暫時派不出大使一節，已蒙科王陛下採納本特使意見，那就是同意由中華民國先派遣駐科大使，至貴國駐華大使的派遣，可俟將來貴國之方便時而定。關於這點，尚有賴殿下在科王陛下前相機進言，予以玉成』。首相沉思有頃，作答：『好罷，本人必竭盡全力以報閣下的至誠』。我即興辭懇謝而退。

十月十八日上午九時半，我和趙副特使準時到達科外交部，科外長欣然起立，和我等握手表示歡迎，並稱：『本人今天得會晤東方第一流外交家，實深榮幸之至』。我亟謙遜的說：『不敢，不敢。最近數日在貴國，覲見科王陛下暨皇儲殿下，禮遇有加，非常感謝！關於貴我兩國建立邦交一節，已成定議，全賴貴國政府諸公之全力協助，使本特使不辱使命，更是由衷的感激；從此貴我兩國增進友好親善，何幸如之』。科外長答：『本人認爲此事尚未完成，將提出明日閣議通過後，才算完成』。我說：『中科兩國建交，昨蒙科王陛下面告：對於此事允予同意，復蒙首相昨日賜予延晤，對於由中華民國先派駐科大使一節，亦未反對；那是科王與首相兩巨頭對這件事的要點均已贊同，明日閣議席間尙能有何人反對？不過徒耗時間而已。』

『且自昨晨科王陛下同意中華民國先派駐科大使後，本人已於昨日電呈 蔣總統報告。今日若再電告，須俟閣議討論通過，豈非科王早已批准照行的事，尙須閣議核准乎？』科外長略覺語塞。我繼續說：『貴外長殆係和我開玩笑，閣議諒尙未舉行，果爾，則請停止提出閣議，將屬深爲明智之舉。貴部長以爲然否？』科外長思考有頃，遂答：『恐亦祇好如此了』。我即從公文皮篋中取出預先備就的「中華民國與科威特政府聯合聲明書」一式兩份，請科外長過目。這篇聯合聲明書大意略稱：

『鑒於中科兩國人民之友誼日增，兩方關係之日益密切，中華民國政府及科威特王國政府願見兩國人民之友誼日益敦睦，兩方關係愈現愈在親密起見，茲兩方協議決定成立邦交，互派大使。雙方並同意由中華民國政府自即日起先行派遣大使駐在科威特，行使外交職權。科威特王國政府得俟認為方便時，隨時要求中華民國政府同意其派遣大使駐在台北，行使外交職權』等語。

科外長對聯合聲明書並未提出任何異議，即由科外長和我分別在聯合聲明書上簽字，互相交換，各執一份，我問：『何時公佈？』科外長稱：『今晚即可公佈，明晨在各報全文披露』。我答稱：『因為電傳手續關係，敝國恐須遲緩一日公佈』。科外長亦欣然同意。我國與科威特王國這一歷史性的建交談判即於一九六三年十月十八日順利完成。從此，中華民國在當時聯合國一百一十個會員國中，又多一個互相承認友好有加的盟邦會員國。每年秋季聯合國審查會員國資格時，我國又可穩得增加支持我國的一票。

我寫這篇短文是敘述已往在外交界服務時期記憶猶新的一件外交任務。駐外使節的職責在遵守國策，依照政府訓示，負責執行職權，目的在增進國與國間的友誼；對於一切國際事務，針對種種情勢，隨時折衝樽俎，不卑不亢，擴大與國，爭取友邦予我的同情，保護本國的各種權益，協同友邦伸張國際間的道義。至於保護僑民與發展貿易關係諸端，當然更屬分內的事。國際情勢的演變至為複雜，亦極玄妙，出於至誠，適當週旋，往往取決於一念之間，均有賴於外交人員高度的智慧與豐富的經驗，始克有濟。拙文所寫「我最後一任的外交職務」一文，是真切描述當年（一九六四年即民國五十三年）我國與科威特王國建交談判的一幕，也就是說明國際間微妙關係的一例。按科威特是宣佈獨立僅三年的一個新興王國，已參加為聯合國會員國之一，和我國向無淵源關係，更談不到和好友誼；驟然而能彼此建立邦交，互派大使，其中不免有若干微妙因素，從而有神奇蹟象的出現。

我在駐伊朗大使任內，奉命以 蔣總統特使身份，與伊朗鄰邦的科威特王國洽商建交，初無勝算的把握，考慮結果，深刻體念政府外交政策之一，是爭取與國和友邦增進友好關係；基於事在人為的信念，不容猶豫，祇有克盡全力以赴。我想：設若當時科威特政府已有決不與我國成立外交關係的既定國策，或已有不與我國建交的判明態度，我方大可不必去探詢該國是否願與我國成立外交關係，原屬無足輕重之舉。但事實上並非如此，鄭重斟酌至再，認為彼此建交或有可能，毅然決定前往科威特拜訪該國政府首腦人物，在短短的四天內，并在融洽友好的氣氛中，週旋商談，非常順利的完成了中科兩國的建交談判，這都是由於 總統蔣公崇高的聲望和科國政府當局明智的抉擇所致，我愧無微功，幸而不辱使命而已。

至於若干年後，科威特王國由於左傾派年青政治人物掌理國政，竟承認北平匪偽組織，同時與我國斷絕邦交，那已不是我任內的事了。